

论圆悟克勤与宋代昭觉寺 的国家寺院地位

◎ 王大伟

【摘要】昭觉寺是四川地区最重要的寺院之一，圆悟克勤禅师亦是昭觉寺历史上最出色的禅师。在克勤禅师住持昭觉寺时期，不仅寺院的管理方式有重大改变，既是寺名也经历“崇宁”、“天宁”、“报恩光孝”等演化。使得昭觉寺逐步走入国家大寺的行列，从而促使昭觉寺在宋代的发展到达顶峰。

【关键词】圆悟克勤；宋代；昭觉寺；国家寺院

【中图分类号】B9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1)01-0112-4

昭觉寺是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寺院之一，自唐乾符年间由建元寺改名昭觉寺^①，此寺名“昭觉”已历1000余年。昭觉寺自唐代起至现代，一直是成都乃至西南地区的重要寺院，它作为成都城外最重要的寺院之一，在成都城市中也具有独特的地位。^②

在宋代，圆悟克勤禅师曾两次住持昭觉寺，为昭觉寺的历史留下美谈，然克勤主持时期的昭觉寺实际上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更，但这些却在《重修昭觉寺志》和《重修成都县志》等方志中没有记

载。可这段历史却又是昭觉寺在宋代最辉煌的时期，不能不说是历史记述上的一个缺失。笔者根据此线索，将逐一论述昭觉寺在宋代革律为禅和创立国家寺院过程中的诸多事迹。

一、纯白禅师奠定基础

革律为禅是宋代佛教的一大特征，昭觉寺在革律为禅过程中也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续传灯录》卷十八记有昭觉纯白禅师：“会成都府帅奏改昭觉为十方，问真觉谁可住持？真觉以师（纯

① 据《重修昭觉寺志》：“乾符丁酉岁，宣宗皇帝诏休梦禅师应对称旨，剑南节度使崔公安潜奏请改建元寺名敕赐寺额。”知昭觉寺在唐乾符年间更易今名。

② 据段玉明先生《寺庙与城市论纲》一文所记，昭觉寺亦是成都“外四大寺”之一，其在成都城市中的独特地位于此可见一斑。详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作者简介〕王大伟，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生，四川 成都 610064。

白)应请,师既领院,遵南方规范一变律居。”^[1]此事件既标志着成都地区出现了革律为禅的大寺院,同时也表示百丈所创的丛林清规式的管理方式进入了四川。但对昭觉寺更大的影响恐怕还是将寺庙改为十方后,使得此寺在宋代逐渐被关注,并最终成为国家寺院之一。

据李岷《重修昭觉寺记》知昭觉寺在真宗、仁宗之际的延美禅师主持下即以建成“朝饭千僧,累茵敷坐,如升虚邑,未有一物,爱假外求”^[2]的大寺院,也因其规模和影响力上的作用使得它有条件改为十方制寺院。据《重修昭觉寺记》的记载:“至今主持大德延美上人,以了觉禅师为五代祖”^[3],但在《续传灯录》中又称“师(纯白)于昭觉为第一代,塔至今存焉。”^[4]笔者认为,真、仁之际的延美禅师时期,昭觉寺大体维持着甲乙制的模式,其中一个特点是按照传统追述祖师,昭觉寺在前纯白时代的发展模式与张商英《随州大洪山灵峯寺十方禅院记》中所记灵峰寺的传承模式类似,也即是虽然是禅寺,但实行的是甲乙制的传承形式。^①到了纯白禅师时代,因为已经诏改为十方制,所以在寺院承袭上也尊其为第一代。这种寺院模式发生变化就更换第一代祖师的事件,在宋元时期也有相关例子为证。如《补续高僧传》卷二十二:“元符二年,知府事温陵吕公升卿曰:‘是一大丛林,特主者未得其人耳。’遂请于朝廷,改十方住持,即报可,即迎致永公,为开山第一祖。”^[5]

《补续高僧传》卷十四:“瑞龙院,易甲乙住持为禅刹,师(梦堂噩公)为开山。”^[6]

《释门正统》卷五:“上方乃巖禅师栖真之所,主僧遇明舍为讲院,请师(庆昭)开山。”^[7]

《释氏稽古略》卷四:“初哲宗元符间,余山有精舍曰‘灵峯’,请部符改额曰‘昭庆禅院’,右丞朱谔致师(法宁)开山住持。”^[8]

这些事例都可以证明在寺院模式发生变化后,寺院的开山祖师也会随之改变,那么纯白住持

昭觉寺后成为“第一代”也就可以理解了。但笔者论述纯白为开山祖师的目的并不仅因他是革律为禅后的昭觉寺第一位住持,而是他代表着昭觉寺在宋代辉煌期的开始,以他为标志,昭觉寺逐步步入了国家大寺的行列。

二、寺院走入国家的视野

昭觉寺在纯白禅师的改革下,已经由子孙丛林变为十方丛林,但这只是昭觉寺在宋代大发展的第一步。紧接着,随着宋代皇帝在全国推广国家寺院,昭觉寺也成为四川重要的国家寺院之一。

宋徽宗崇宁二年:“癸巳,令天下郡皆建崇宁寺。”^[9]另外,《释氏稽古略》卷四:“诏天下军州创崇宁寺,又改额曰‘天宁寺’。至高宗改报恩寺光孝,追崇严荐”^①《释氏稽古略》的记载已经将崇宁寺的演化说明清楚了。刘长东先生考证了此种寺院的住持任命方式,“徽宗在崇宁二年十月九日曾诏‘崇宁寺观并依十方住持’,次年二月八日又重申‘崇宁寺主首,依禅寺选僧住持’。”^[10]我们从此几则材料可以看出,所谓的崇宁寺或天宁寺在宋代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也与学界已经论述过的“敕差制”和“十方丛林”等宋代寺观管理问题相关,而昭觉寺在宋代正是四川地区具备“敕差制”与“十方丛林”等特征的寺院。这一类型的寺院已经进入了国家的视野,处于国家寺院的位置。也印证了纯白禅师在革律为禅中的先锋作用,使得该寺具备了树立为国家寺院的资格,笔者将梳理昭觉寺走向国家寺院的过程。

正如上文所述,在元符年间昭觉寺改为十方丛林后就具备了成为“崇宁寺”的资格,就目前的材料,笔者认为在崇宁年间昭觉寺即是首先被立为“崇宁寺”的寺院之一,试论述如下:

克勤禅师曾两度住持昭觉寺,第一次既在崇宁年间,《补续高僧传》卷九:“崇宁中省亲还蜀,诸老相谓曰:‘道西行矣’,时同门佛鉴慧勤,亦知

① 《大正藏》,第49册,页880下。另外,刘长东先生据相关材料认为改崇宁寺为天宁当在政和元年,见《宋代佛教政策论稿》,309页。

名众，遂目师为川勤别之。成都帅郭知章请开法六祖，更昭觉凡八年。”^[11]虽然《重修昭觉寺志》并未言明崇宁年间昭觉寺曾被改为“崇宁万寿寺”，但其他材料中还是可以确定昭觉寺在宋代曾更名为“崇宁”。《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一：“住成都府崇宁万寿禅寺，师在昭觉，初受六祖请。”^[12]从这个材料我们可以确定成都当时肯定存在一所崇宁万寿禅寺，另外该语录还明确记载“改昭觉寺为崇宁，勅黄到。”^[13]同时在《瞎堂慧远禅师广录》中也记有：“奉为前往成都府昭觉天宁万寿禅寺圆悟真觉大禅师，不重佗对，御谭玄横行海上，只重佗胸中无物肚里无禅”^[14]语。上文笔者已述及“崇宁寺”在徽宗政和年间又改名为“天宁寺”，故《广录》中“昭觉天宁万寿禅寺”当即“昭觉崇宁万寿禅寺”更名后的称呼。以这些材料相断，昭觉当有被改为“崇宁”的一段经历。这发生在克勤禅师第一次住持昭觉期间，昭觉寺的地位也提升到国家寺院的位置。

“崇宁寺”曾改名为“天宁寺”，而“昭觉崇宁万寿禅寺”也经历了这一过程，我们可以从《天宁万寿禅寺置田记》一文中作出推测，张浚在归蜀后，受克勤之请为昭觉寺置田，此时的昭觉即已改名为“天宁万寿禅寺”，“岁在癸丑，予解使事，归省庭闱。勤冲冒大暑，远来问劳，始为予言：‘克勤住昭觉之八年，复为南游，殆二十年而归，今执扫洒之役又四年矣。参徒日众，聚指三千，后将有不给之忧。我之归蜀，尝捐千万钱鼎新妙寂，回视篋中所有尚八百万，将求成于大檀越市田千亩，为久远计，上祝皇帝万寿无疆。’”^[15]此文末后题记述时间是“绍兴三年”，很明显，这是克勤第二次住持昭觉寺时期所为。可见，昭觉寺作为当时成都的国家寺院，同样经历了由“崇宁”改为“天宁”的过程。刘长东先生考将“天宁”改为“报恩光孝”为绍兴七年的事，^[16]那么此时的昭觉寺还当名为“天宁万寿”。

笔者虽未在材料中明确的看到昭觉曾正式更名为“报恩光孝”的记载，但依据《释氏稽古略》和现在可见的其他报恩光孝寺的史料，大致可以确定昭觉寺也曾更名为“报恩光孝禅寺”。

克勤时期是昭觉寺在宋代最辉煌的时期，据相关资料，他的二次住持昭觉都是奉敕而行，“改昭觉寺为崇宁，勅黄到，开堂，师拈勅黄示众云。”^[17]此次当是崇宁二年左右徽宗在全国建立崇宁寺时期的勅黄。第二次住持昭觉是在高宗时期，据《重修昭觉寺志》载，此次的住持亦是奉持而来，“绍兴初，高宗皇帝诏改昭觉为丛林，勅黄到，请圆悟克勤禅师开堂”^[18]，在同书中也记载了这篇敕文：“币地普天，皆成恩力，九州四海，悉秉威灵。百千法门之外，殊特法门；无量妙义之中，真实妙义。克勤禅师者，鸡园上品，鹿苑名家，早空六妙之门，无惭饶舌接引，四流之岸竟许，安心飞锡所致。法雨咸沾，布金而来，愿云共领。特启祇园世界，广引方袍，宏开觉路，津梁都成。圆具玲玲振策，允为万德之师，凛凛戒规，直入三摩之地于戏。道生说法，石亦点头；罗什谈禅，严具撒手。普济僧人行脚，象负以游，定凝菩萨低眉，鸠分而食遍，澈醍醐同登欢喜。”^[19]此两则材料基本可以证明克勤禅师在昭觉寺时期都是奉敕住持，也即是“敕差住持”。克勤自称“七处住持三十载”^[20]，且历次住持几乎都为敕差，^①其中有两次在昭觉寺，我们从中似乎也可以推测出昭觉寺在克勤住持生涯中的重要地位。

宋代寺院的模式大体可分为甲乙制和十方制，这是根据寺院管理者的选择方式。而所有寺院中表示其地位高低的另一个标准则是否是敕差制寺院，敕差制也是宋元时期寺院的一大特点，也即是国家安排寺院最高管理者的制度。在宋代，敕差制多是专为国家大寺设置或表示恩宠某位禅师而特行。克勤禅师一生都受到帝王、贵臣的厚遇，对其住锡的寺院实行敕差既是对其褒奖，亦

① 如《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四：“住建康府蒋山，师在潭州道林受请，拈勅黄示众云”（《大正藏》，第47册，页727下）《语录》卷五：“师在蒋山受勅，拈示众云。”（《大正藏》，第47册，页733上）《语录》卷六：“师在高邮干明受勅，拈起示众云。”（《大正藏》，第47册，页738下）等。

是对昭觉寺在四川地区独特地位的认可。他两次住持昭觉都是敕差,也正反证出昭觉寺在当时四川地区的大寺地位。

正是在克勤禅师的努力下,昭觉寺的佛法成为成都寺院“正法”的代表,《金绳院增广常住田记》记有:“成都诸刹,以昭觉正法为大,保福、信相等次之”此文作于“淳熙甲午后之数年(1178年前)”^[21]陆游亦称昭觉为“正法”:“旧在成都,初春无事,日访昭觉、保福正法诸刹,甚可乐也,追怀慨然,因赋长句。”^[22]由此可见,昭觉寺在当时作为“报恩光孝禅寺”的影响力在高宗之后依然存在,依旧是当时成都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寺院。

余论

通过如上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昭觉寺在纯白禅师开创了丛林模式后,为其在宋代的发展埋

下伏笔。此寺进入克勤禅师时代全盛,克勤两住昭觉,两次敕封,也促使昭觉寺经历“崇宁万寿禅寺”,“天宁万寿禅寺”,“报恩光孝禅寺”等一些列变身,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敕封住持”的殊荣,从而走入国家寺院的行列。《重修昭觉寺志》中称其为“吾蜀第一名蓝”^[23],可见此论并非空穴来风,光从昭觉寺革律为禅的时间和影响力及克勤禅师时期昭觉所处的国家寺院位置,都可称得上“第一”。

宋代的昭觉寺与克勤禅师具有紧密的联系,克勤禅师回蜀归省和最终奉养都选择昭觉寺,足见昭觉寺本身已经具有一定的地位,在克勤禅师的经营下,昭觉寺在宋代已经游走于国家寺院之列,这也为昭觉寺的发展奠定基础,可以说昭觉寺能够成为日后成都“外四大寺”之一,最重要的奠基人应该即是圆悟克勤禅师。

【参考文献】

- [1] [4] 大正藏:第51册[Z].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587,587.
- [2] [3] [15] [21] 龙显昭.巴蜀佛教碑文集成[M].成都:巴蜀书社,2004.90,90,158,196.
- [5] [6] [11] 卮新纂续藏:第77册[Z].东京:国书刊行会,510,471,429.
- [7] 卮新纂续藏:第75册[Z].东京:国书刊行会,319.
- [8] 大正藏:第49册[Z].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892.
- [9] 宋史·徽宗纪:卷19[M].中华书局标点本,368.
- [10] [16] 刘长东.宋代佛教政策论稿[M].成都:巴蜀书社,2005,310,309-210.
- [12] [13] 大正藏:第47册[Z].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714,716.
- [14] 卮新纂续藏:第69册[Z].东京:国书刊行会,556.
- [17] [20] 大正藏:第47册[Z].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716,749.
- [18] [19] [23] 四库未收书辑刊(9辑7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104,141,147.
- [22] 陆游.剑南诗稿:卷12·文渊阁[M].四库全书.

(责任编辑 李远国)